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新文化运动



7
261.103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97
K261.103
4
2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新文化运动

朱志敏 编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新文化运动

朱志敏 编著

目 录

一、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1)
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	(7)
三、打倒孔家店	(12)
四、文学革命	(19)
五、宣传“个性解放”	(26)
六、新旧思潮、东西文化之争	(32)
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38)



C

367868

一、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1915年盛夏，闷热的天气几乎使人们透不过气来。

5月9日政府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压力，准备接受最后通牒，签定中国与日本之间关于南满、东蒙、山东的“条约”和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的“换文”（即二十一条）以来，各地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议集会、抵制日货运动，在大总统袁世凯的严令敦促下遭到镇压。不久，报纸上又登出政府聘请的宪法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鼓吹中国宜实行君主制的言论。紧跟着，那位因写了《君宪救国论》而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联络总统府顾问孙毓筠、国学大师刘师培等发起组织“筹安会”，以筹划“一国之治安”为名，发表鼓吹帝制文章，掀起关于国体问题的争论，并且配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府要员，四处组织请愿团。一时间，帝制风潮沸沸扬扬，政治空气的热度不断上升。筹安君子们热得发昏，一心想黄袍加身的袁大总统烧得发昏，而那些追求民主的真正爱国志士、知识分子则气得发昏！

这一天，坐落在上海棋盘街上的群益书社门口，一辆黄包车刚刚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位三十六、七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长方的脸庞，前额饱满，眉骨略凸出，两道粗眉下，一双不大的眼睛射出犀利的目光。他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的陈独秀。

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即现在的

安庆)。因家乡附近有一坐独秀山挺拔屹立,后来他写文章时一度使用“独秀”、“独秀山民”的笔名,久而久之,“独秀”反而成为人们熟知的名字了。

陈独秀小时候聪明、顽皮、倔强,感情易冲动,不怕鬼神、不畏强暴,又同情弱者。有时因不服管教遭到祖父严厉的责打,总是一声不哭。祖父不止一次愤怒地骂他:“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强烈感受到了大清王朝的衰败不堪,以及列强势力威逼压迫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屈辱。他奋起投入反清斗争,办报纸,结交名士,组织革命团体,联络同志进行活动,并数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有时不得不流亡国外。

辛亥革命以后,陈独秀目睹了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派人刺杀民主斗士宋教仁,废除《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步步走向独裁,而多数国民浑然不知不觉,甚至附和专制、拥护复辟的现实,感到忧心如焚。

1914年11月,他在日本协助著名政论家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指出真正的爱国应该认识国家的目的和形势,爱人民的国家、民主的国家,而不应该盲目地以忠君思想去“爱”滥用国家威权,残民误国的“恶政府”。文章中悲愤过激的语言遭到不少人的非议。为此,他想办一份杂志,进一步宣传他的“自觉心”思想。他找到主持亚东图书馆的同乡好友汪孟邹,请求资助。汪虽然与他是莫逆之交,但苦于财力不足,难以承担杂志的印刷与发

行，于是向陈介绍了群益书社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知道陈独秀即是10年前驰名全国的《安徽俗话报》的创办人和主笔“三爱”先生，当即拍板，同意为陈每月支出编辑费200元，出版一期刊物。刊物的名称定为《青年杂志》。后来因上海青年会向群益书社提出《青年杂志》与该会出版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有冒名之嫌，陈子寿与陈独秀相商，于1916年9月发刊第二卷时起，将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备受屈辱。一开始，人们以为中国只是武器、运输工具和工商业比西方国家落后，因此开办军械厂、船政局，制作洋枪、洋炮、火轮、舰艇，又开办民用企业，以及铁路、航运、电报局等通讯交通事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挨打的局面。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开始认识到，单靠“器物”的更新还不足以救国，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是导致国家衰弱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幻想依靠有开明思想的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阻挠破坏，落了一个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康、梁亡命国外的结局。其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从而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政治。

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和富强。国

家政权落入野心家手中。短短几年之间，“中华民国”就成了一块徒有虚名的招牌。这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才进一步认识到：国家政治的进步仅靠政治本身的变革也还是不行的。政治的更新有赖于国民思想觉悟的提高，而国民思想是与千百年来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影响分不开的。要改变国民思想，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要建立近代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就必须使国民具备近代西方国家人民的思想。陈独秀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创办《新青年》杂志的。

《青年杂志》之所以以“青年”命名，是因为在陈独秀看来，青年好似初春、朝阳，好像刚刚开放的花朵，如果把社会比作入体的话，青年就是新鲜活泼的细胞。他希望青年“自觉奋斗”。“自觉”就是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对社会的责任，自强自尊；“奋斗”就是要发挥各人的智慧和能力，同陈腐落后的人物与思想作坚决斗争，决不与之同流合污，也决不受其影响。他在《青年杂志》第1号开篇《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青年应具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思想和行为品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说的是人应当有平等自主权利，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善恶；一切思想、信仰、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思考，决不盲从别人、依赖别人，当别人的奴隶，也决不让别人当自己的奴隶。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说的是人应当跟上宇宙发展、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求新，接受先进的事物。认识到中国固有的

伦理、法律、学术、风俗已落后于时代，失去存在的价值。不当让这些落后的“国粹”束缚自己。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说的是人应当勇于进取冒险，在艰难的环境下抗争，战胜恶社会，而不被恶社会所征服，切勿为洁身自好而忍让退缩。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说的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已渐成互相之间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生当此时的青年应丢掉闭关锁国的思想，了解世界，掌握各国知识。否则个人将落于时代，国家也将无法在世界上立足。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说的是应接受西方思想家提出的“实利主义”、“实验哲学”，以“利用厚生”为人类生活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现实生活问题，抛弃同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的表面文章和道德说教。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指出科学是空想的对立物，是消除迷信、根治无知的武器，是推进社会发展、知识进步的重要因素。近世欧洲之所以进步，“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中国人民若想脱离蒙昧和浅陋，“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即应把科学放到与人权同等的地位来看待。

以上六条即是陈独秀对青年提出的希望，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他理想中新的时代整个中华民族全体人民所应具备的新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这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和第六条，也就是“人权”与科学。这里的人权主要是指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属于民主思想范畴，或说民主精神、民主原则。它与民主政治观念密切相关，所以后来也被归结为民主思想。对民主和科

学的宣传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首要内容,《新青年》杂志后来发表的许多文章是围绕这两项内容展开的。

民主和科学又被称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两面大旗。

启蒙运动原本是指 18 世纪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全面批判,企图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基督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而发起思想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们能够凭借理性的力量发现有关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取自己的幸福。他们提倡理性、宗教容忍和进步,乃至无神论、唯物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反对禁锢思想和压制自由的教条和制度。“启蒙”的英文 Enlight,带有以光明驱逐黑暗之意。因此,也可以说启蒙就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启封建专制、保守落后意识之蒙。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中心,波及到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俄国等许多国家,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为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排除了思想障碍,并且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后来启蒙运动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普遍称谓。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上承了严复、梁启超、谭嗣同,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启蒙宣传,以传播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方进步思想为手段,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文学、艺术、思想观念发起了猛烈攻击,目的是要把中国人民从封建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正是 20 世纪中国的启蒙运动。

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则是这场伟大运动的揭幕人和领导者。

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

在清末民初北京城地安门内的马神庙(即现在的景山东街)一带,有几十栋新旧相间的房舍,这里是京师大学堂校址。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8年。它最初是承继清朝国子监的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1912年5月,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学者、翻译家严复被任命为该校的第一任校长。

1916年的北京大学经严复和另外几位继任校长的努力,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全校有文、理、法、农和预科学生1500多名,有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开设国文、伦理、中国史、外语、西洋史、法制、经济、逻辑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画图等多门课程。这年6月,学校从比利时仪品公司借款20万元,在原有的操场动工兴建一幢有300多间房屋的校舍。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红楼”,亦即北大第一院所在地。但由于受到社会上和校内不良风气的影响,学生中不少人求学的目标是毕业后升官发财,或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好职业。有的托门路,找靠山,有的游手好闲,不用心学习,考试打小抄。教师中有的思想陈旧,大肆宣扬复古读经,有的只是混碗饭,平时不事研究,上课敷衍了事,也有的道德堕落,赌博、当嫖客。这种情况直到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才得以改变。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子民,是辛亥革命期间有影响的领导者之一,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1892年他24岁时考中进士,随即进翰林院,点庶吉士,两年后做编修。

清朝的翰林院是掌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注”,给皇帝讲解经史,及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的机构。每当新科进士产生后,其中文学书法较优秀者被选入翰林院所设庶常馆继续学习,称庶吉士。庶吉士经2—3年的学习,再参加考试,成绩优异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配到各部门担任主事等职务。蔡元培26岁授编修,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但他没有沉醉于个人对未来美好的幻想,而是深深为危机日深的国家和民族担忧。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对清廷彻底失望,断然弃官离职,返回浙江绍兴老家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他与好友发起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事务长(即会长)。又创立爱国学社,被推为总理。1904年,革命团体光复会成立,他又被推为会长。光复会后来和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等团体合并成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核心。

1898年,31岁的蔡元培为了阅读外文书籍,拜师学习日语。第二年又开始学习英语。以后他多次游学日本、德、法等国家,翻译、编译了不少日文、西文书籍。他翻译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和他编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成为许多学校选用的教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民国教育总长。在短短6个月的任期内,他对民国教育

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意见。如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等等。他还把清朝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修改为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现、美育等五项内容的新教育宗旨。并且用中国传统道德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来解释法国大革命时代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含义。在蔡元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积极的内容可以和现代西方进步思想中的科学、民主内容融合在一起,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原则,为新时代的中国国民吸收和运用。这一点构成了他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提出“兼容并包”思想的基础。

1917年1月,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校长职务。在就职演说中,他首先提出:大学的宗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遵照这一宗旨,他对学校的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授方法、教师的录用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领导成立了进德会,加强师生和道德修养。他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一所现代化的高等学府。

蔡元培在改革中提出了一项重要思想。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应依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允许不同学派、不同主张同时并存,以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他依此原则聘请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其中既有留学欧美的西化学者,也有拖着长辫子的国学先生;既有思想激进的新文化健将,也有反对革

新、宣传复古尊君的保守人物。当然，录用的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具有学术专长。在思想方面，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以至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都被允许介绍和研究。此外，蔡元培还鼓励并支持师生建立各种学术性、社会性团体，创办刊物，参加指导社会的活动。这就为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最初由他一个人编辑，大部分稿子也由他一个撰写。虽然他在当时已颇有名气，他的文章气势磅礴，观点清新，但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每期杂志只印 1000 多份，其中不少用作赠送、交换，购买者并不多。为此，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赔了本，一度曾打算取消和陈独秀的合同。

1917 年 1 月，陈独秀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这个职务类似现在的文学院长。《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由上海搬至北京皇宫东侧北池子箭杆胡同 9 号陈独秀的住所进行。此后不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17 年 9 月，胡适应陈独秀、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授。1918 年 1 月，李大钊由章士钊介绍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与此同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和他的弟弟，在北大做文科教授的周作人也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领导阵营就这样形成了。

1918 年 1 月，《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编辑部的人员自己写稿。后来又采用轮流编辑的办法。从此以后，杂志内容更为丰富，销路渐广。到五四运动发生前后，每期销售量竟达

到一万五、六千份。购买、阅读《新青年》的除北京大学师生外，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长沙、南京等地许多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教师和社会青年。不久，在陈独秀等人周围逐渐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这些青年从《新青年》杂志的文章中，从他们敬仰的先生们的授课与交谈中吸收新思想、新观念，并很快成为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更为积极、热心的宣传者。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同时，北大学生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孟寿椿等发起组织了国民社。国民社的成员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地青年学生和一些留日、留美归国学生，共180多人。这两个社团的刊物《新潮》、《国民》均于1919年初创刊。在此前后创办的刊物还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主编的《每周评论》、北大教授朱希祖、陈启修等编辑的《北京大学月刊》，以及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五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新教育》月刊。这些刊物和《新青年》一样，刊载有大量的宣传新文化内容的文章。此外，上海《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北京《晨报》副刊、《京报》等也先后转向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由初起时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了浩瀚江河，其范围和声势都大大地扩展了。

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批有新思想的青年学生走出学校，前往市区、工厂、农村进行讲演。他们的讲演内容丰富，题目众多，有“家庭制度”、“人生之要素”、“什么是我”、“迷信”、“国民应尽之责任”、“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等等。不仅宣传了新文化，而且为五四爱国运动作

了准备和动员。

五四运动中和五四运动后，以北大在校学生、毕业生及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山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青年学生为骨干的社团和他们创办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新民学会，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都是其中颇有影响的社团。《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新中国》、《新群》、《曙光》、《少年中国》、《建设》、《觉悟》、《解放与改造》、《新社会》则是这一时期众多新刊物的代表。为了扩大新文化的影响，新青年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争相编辑新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等许多出版机构也开始出版大量的新文化图书。这些出版机关自行编辑的期刊杂志，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也陆续进行改革，刊载越来越多的宣传新文化的文章。至此，新文化的宣传已成为全国范围内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三、打倒孔家店

孔子名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据说他搜集整理了周代典籍《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将其作为教授学生的经典，并且提出了一套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成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死后约 100 余年，孟子出世。孟子名轲，是孔子之孙子思门人的学生。他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他的言论被

学生整理成《孟子》一书，同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论语》，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一同流传后世。孟子被认为是孔子的嫡传后人，因此，后代人就把孔子和孟子的学说称为“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在孔子、孟子的时代，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了西汉年间，汉武帝采纳了学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的主要依据。孔子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以至于被戴上“大成至圣先师”等桂冠。儒家思想经历代学者的总结、改造，成了维护封建皇权统治、保护封建社会秩序、规范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

遵循这套原则，各朝代的皇帝表面上以仁义道德自勉，要求臣民百姓向其尽忠。社会上形成了一套尊卑等级制度，各人依照名份循规蹈矩，违反者在道德上被认为是非礼，在法律上被认为是非法。学生读书以儒家经书为主要教材，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文人学士以知书达礼为尊荣，以通晓儒家经典为学问高深。普通百姓中间流行着被通俗化了的儒家训诫，《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等成为少年儿童的启蒙教科书。这样，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里，从皇帝、官僚到普通的平民百姓，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孔孟的价值原则、行为规条便深深浸入到人们的意识当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封建思想特征的国民性格的中国人。

流传的儒家经典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如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是应重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面不应把皇帝一人一家的利益置于人民和国家之上。孔子说：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要求人们做有志向，讲气节的“大丈夫。”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遇事不要凭主观臆断，不要走极端，不要固步自封不求进取，不要自以为是，听不得他人意见。还有儒家讲孝敬父母、尊师敬友、讲究信誉等。这些对于社会和人生都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性意义。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强化了儒家思想为其剥削压迫制度服务的一面。其中突出的就是从儒学“礼”的内容中阐发出一套“三纲”学说。

“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是指拉网的绳子，这里引申为主体、首领。君为臣纲是说君为主，臣为辅，君是臣的首领，是指挥臣的，臣要绝对地服从君，忠于君。父与子，夫与妻的关系也是如此。这种不平等意味着为君为父为夫者可以为所欲为，为臣为子为妻者不能提出自己的独立意见。它不但造成了社会与家庭中明显的等级差别，而且使为臣为子为妻者养成不能独立思考，惟有依赖他人、服从他人的习惯。这种状况既不符合近、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要求，同时也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限制了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因此，对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批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就对儒家思想展开了批判。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